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史实辨析】	文革前军内的一场大搏斗——罗瑞卿案辨析	丁凯文
【史海钩沉】	1966年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的由来	余汝信
【史实考证】	以讹传讹的林彪专机黑匣子	蒋 健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实辨析】

文革前军内的一场大搏斗——罗瑞卿案辨析

· 丁凯文 ·

2015年1月号的《当代中国史研究》发表了黄瑶先生的文章：《1965年中央军委作战会议风波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黄文”），该文又在5月7日“共识网”上推出。研读“黄文”后发现，该文旨在批评2014年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罗瑞卿案》一书，“黄文”将此书定性为“一个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并予以彻底否定。“黄文”特别强调：“现在，有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士常采取这样的手法，即把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又翻出来，予以漂洗、放大，来证明冤案不冤，林彪无错。”《罗瑞卿案》一书实际涉及到的的是整体的罗瑞卿事件，而非“黄文”谈及的一个“中央军委作战会议”，用一个“军委作战会议风波的来龙去脉”是无法全面、完整地解释罗瑞卿事件的。那么，如何看待发生在文革前夕的这场军内斗争？官史历来的说辞都是林彪策划整倒罗瑞卿。近年来由于新的史料的出现，“罗瑞卿事件”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罗瑞卿案》一书由此而生。笔者也是《罗瑞卿案》一书作者之一，面对黄瑶先生的批评，愿就此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就教于方家。

◇ 《罗瑞卿案》一书的主旨

既然“黄文”批评《罗瑞卿案》一书是“一个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那么我们不妨首先了解一下此书出版的原因和该书主要内容。此书编撰者余汝信先生在“后记”中就该书的出版作了明确的说明。“后记”说：“个别‘当事人’的所谓‘回忆’，不仅对澄清历史真相没有丝毫帮助，反而，对历史真相还起了扭曲、屏蔽的反作用。这里，我们针对罗瑞卿事件所指的主要就是2012年9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林豆豆口述》一书所载、林立衡与张清林写于1980年间的《我所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1）

“后记”进一步说明：“由于《林豆豆口述》一书的编者首先公开了林立衡、张清林这一份原用于申诉的材料，因此，我们有理由公布我们手上已有的、出自于两位作者本人手写的原始版本。同时由国内外几位颇具知名度的中国当代史学者及亲历者，对此一申诉材料进行认真的探究和考辨。”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林豆豆在1980年代的申诉材料的曝光，特别是材料中涉及到文革爆发前夕军内发生的“倒罗事件”的前因后果，引发了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位学者就罗瑞卿事件做一番深入的探讨和考辨。撰写考辨文章的作者有华东师大教授韩钢，还有知情者樊真、沪林。此外，国内当代史研究者萧冬连先生为此书写了一篇《代序》，实际上也参与了讨论。

细读韩钢的《“罗瑞卿事件”的林豆豆说法之考辨》、樊真和沪林的《可悲的谎言》，他们认为林豆豆有关罗瑞卿事件的回忆在某些问题上颇有疑问，为林彪所做的辩护有些是难以成立的，无法自圆其说的。樊真和沪林对林豆豆的批评尤为尖锐、严厉。萧冬连先生指出官方就罗瑞卿事件的解释“显然回避了主要事实”，而“军内矛盾远比我们原来了解到的复杂”。萧先生判断，由于军内矛盾的激化，无论毛泽东是否信任罗，罗的命运已经注定，更何况毛正在酝酿发动文革运动，亟需林彪支持和军队的稳定。所以，萧先生倾向认为“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是林彪，但下决心的是毛泽东。”

正如余汝信先生在“后记”中所言：“几位作者同时指出，虽然直至今日，罗瑞卿一案是毛亦或是林首先主动提出尚有争议的空间，惟以下看法应该是一致的——毛泽东当然是罗瑞卿一案的最终拍板人。然而，林彪的确介入了罗案的处理全过程，完全无视林彪在罗案中的作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此外，为了求得全书观点的平衡，《罗瑞卿案》一书还特别收录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一书中的部分章节，以及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的口述回忆，并附有叶群在1965年12月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摘录等。

多年以来，在官史的诠释下罗瑞卿事件的起因是林彪在作恶，林彪刻意诬陷了罗瑞卿，而毛泽东仅仅是偏听偏信，错整了罗瑞卿，至于其他中共老帅和军队将领的作用则全部消失于无形。然而，当新的史料，尤其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出现之后，官史的解释就露出了种种破绽。本书的几位作者根据已有的和新出现史料，对罗瑞卿案做了一番新的梳理，就罗瑞卿事件尽可能做一客观、公正的诠释。林豆豆的申诉材料可以看作其个人的回忆，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学者们既指出了其中有违史实之处，同时也分析探究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换句话说，研究者们既非简单认同、接受，也不是简单地予以否定，而是做出合情合理的解析。如果不戴有色眼镜阅读《罗瑞卿案》，此书的终极目标绝非是什么“把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又翻出来，予以漂洗、放大，来证明冤案不冤，林彪无错”。

所以，笔者在这里首先要说的是，“黄文”一开始给《罗瑞卿案》一书定性为“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有违客观与公正，这个定性本身就是诬蔑不实之词。

◇ 中央和军委对批罗的部署

黄瑶先生认为，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交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是一篇已经被推倒的报告，并将该报告中一小段有关罗瑞卿和林彪关系的内容拿出来加以辨析。通读“黄文”，黄先生想证明余汝信先生编辑的《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里引用了这段“不实”内容，因此推导出整体的“大事辑要”和《罗瑞卿案》全书都是不可靠的，是“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那么该报告又是从何而来呢？

谈到1966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我们就不得不简单回顾一下1965年12月初的上海会议。这次上海会议是毛泽东为了解决罗瑞卿问题而专门召开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政治局常委仅陈云一人未参加，其余参加者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

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各中央局负责人、中央军委、各总部、军种和大军区负责人等，共61人与会。正如余汝信先生编纂的《大事辑要》所言：“上海会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样高规格的会议，只有毛泽东动用其中央主席的权力才有可能召集。毛尤喜欢使用类似‘扩大会议’的形式，随心所欲地将到会人等扩大至他本人认为合适的范围。上海会议到会总人数61人（原定63人，刘伯承、聂荣臻2人请假未到会），已经是常委人数的八至九倍。以党内最高层加上其他重量级人马共61人去对付罗瑞卿一人，充分说明了毛对罗问题的极其重视程度。”

上海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上海会议之后，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所有职务皆被解除。罗瑞卿的实权性职务一分为二，叶剑英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杨成武出任代总参谋长。叶剑英、杨成武和总政主任萧华，成为1966年间实际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工作的三驾马车。

套用中共常用的语言，上海会议仅仅是“揭了盖子”，还需要召开另一次会议对罗瑞卿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于是就有了北京会议的召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1966年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军委、总参、总政、总后、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负责人参加的“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该会议由邓小平、彭真和叶剑英主持。但是会议召开后，邓小平去了外地视察，并指定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和谢富治组成领导小组，这个会议实际上由叶剑英完全主导。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2月1日到4日，中央军委常委在广州召开了第51次会议。几位军中老帅叶剑英、贺龙、聂荣臻、刘伯承、陈毅和徐向前分别谈了各自的看法。叶剑英称：“我们在战略上藐视，他（指罗瑞卿一笔者注）是纸老虎。在战术上要当作真老虎打，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我们作自我批评，作了自我批评，并不是和罗一样，是认识问题，要划一条线。”聂荣臻称：“这个人的弱点，长期以来看得很清楚，过去谅解，现在看不是作风问题，他自己不舒畅，我想找他说，说不进去。我们按党的组织纪律办事。对罗丝毫不能存在幻想，丝毫不能让步，让步军队就要变色，适当的时候要作出结论，将来下放不能到大三线。不要看他的表面，要看到他的本质，他是个危险人物，要防万一，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刘伯承称：“对这个人不要低估了。”陈毅称：“到一定时候，要面对面的斗争，要搞突出政治，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是伸手。”徐向前称：“这是个危险人物，林总都不在话下，我们更不在话下。专门出风头，到处演讲。”（2）这些中共老师们的谈话虽然有政治性表态的成分，但是更多的是发泄对罗的不满，罗对这些老师的不尊重，使得他们难以忍受，这次他们终于有了反击的机会。

2月8日，林彪就罗瑞卿问题作了指示：“他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这是个危险人物，危险的炸弹。毛主席、刘主席健在，他搞野心阴谋，如果党发生了困难，他就会造反、出乱子的。”（3）

2月21—22日，叶剑英、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军事工作。22日，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叶剑英、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关于揭批罗瑞卿问题的准备并听取指示。叶、杨汇报了准备召开小型会议，面对面地批判罗瑞卿的问题。叶汇报了会议领导小组的组成、会议的开法和主要解决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无组织纪律、个人主义思想作风三个方面问题，并得出结论。杨报告了2月上旬在广州时军委各位副主席对罗瑞卿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毛表示：我赞成。

（4）由此可见，毛泽东最终批准了中央工作组批罗的整体部署，也批准了中央工作组对罗瑞卿案的定性。日后的那个《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不过就是根据这些定性在会议之后所形成的具体文件。

毛泽东本人对罗瑞卿不仅有很清晰的认识，也有很贴切恰当的评价。毛在1966年1月5日与江西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等人谈话时谈到罗瑞卿，毛泽东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谈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他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1966年6月，毛接见秘密访华的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时再次提到罗瑞卿。毛说：“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与评罗截然相反的是，毛对林彪有很高的评价和赞扬。对于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毛在1965年2月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这是个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1966年6月，毛与胡志明的谈话时也提到林彪：“后头又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们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你看，怪不怪呢。”显而易见，毛泽东对军队与罗瑞卿、林彪的关系知之甚深，在“倒罗”问题上绝不可能被林彪误导或偏听偏信这么简单。

为了开好批罗的会议，叶剑英、萧华、杨成武都谈了批罗的准备工作。叶剑英称：“揭露这件事是空前的，这件事的危险也是空前的，事情的恶劣性质也是空前的。公开在林总面前要国防部长，病人要像病人的样子，不要挡路啊！我是当接班人的。林告我后，我对他的认识一百八十度转弯。这种人有了军权就要夺党权，已经是书记、副总理，还要什么，这是大地主思想的集中表现。要用这件事教育全党全军。”“要把这个仗打好，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三个主题，其他问题就不搞了。材料要一件件落实，做到无懈可击。要明了罗的本质，明了罗的事实，还要明了中央的意图。毛主席说，搞这种事的人，总有一伙人。”萧华称：“这个人是没有改造好的大地主。有些枝节问题不要在会上讲，重要问题是突出政治，组织纪律，个人主义，向党伸手。要讲的问题，都要有充分准备。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的态度要非常明确，不能有任何自由主义，不能有任何的幻想。这个人是个纸老虎，戳穿了就是这么回事。”杨成武称：“主席说，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已陷进去了。罗是个野心家，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看待。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兵，难道还不懂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主席说，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看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林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陷了进去。罗个人专断，罗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5）

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罗部署来看，罗瑞卿的罪名在会前就已拟定好了，日后的会议不过就是落实这些罪名，走完一个组织手续。

◇ 北京会议的过程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常委的决定，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召开由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负责的解决罗瑞卿问题中央工作小组会议，邓、彭、叶三人是会议的主角。

3月4日上午，邓小平代表中央在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对会议的开法和指导思想作了明确指示：“小组42人。为什么成立小组，为罗的问题。12月中旬在上海谈了这个

问题，根据主席指示，背靠背的方法，罗没有跟大家见面。常委指定恩来和我与他谈，把会议的情况告他，要材料看，没有记录。”“在主要问题上搞清楚，枝节问题、无关紧要的问题，扯多了没有意义，特别是对方针、原则性的问题，大家要扯清楚。根据常委的讨论，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同意，考虑需要两步，一步上海式，一步是在一起谈一谈，包括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各军区都有人，说清楚对军队的工作也有积极的作用，对毛泽东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有益处。”（6）

从邓小平的指示来看，邓对批罗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指示还有余地和分寸。邓说：“罗觉得不如大家讲的那么严重，总觉得有出入，实际上有委屈的情绪。这个问题怎么办？根据党内历来的办法，摆事实、讲道理，讲清楚嘛。罗区别于彭（德怀）黄（克诚），彭黄的问题也采取这个态度，对王明也采取这个态度……可先让同志们把对罗的意见讲完，也允许罗把自己意见讲出来。最后怎么样，总有一个统一的想法，中央作出自己的决定。”邓还说：“实事求是，对罗也是一看二帮。任何人要革命，允许他们申辩，彭还有个万言书……”（7）

然而，会议的进展有时却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会议的第一阶段历时13天，参加成员包括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人，以及罗瑞卿本人，共42人。3月12日，罗瑞卿作第一次检讨发言。至3月16日，发言批判罗瑞卿的共有23人。3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扩大会议范围，请中央、国务院有关各部委及各大区中央局和有些军区、兵种、学院等派人参加。会议通知罗瑞卿休会两天后再继续开会，罗瑞卿3月18日晨跳楼自杀受伤，不能再参与会议。从3月22日开始，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中央指示，增加了53人，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人，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负责人。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有95人。揭发批判罗瑞卿者包括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联名），还有刘志坚、张宗逊、邱会作、唐平铸、李曼村、张秀川及邓汀。如按人头来算，这13份揭发批判也仅仅占了叶剑英所说的86份总数的15%。

从会议的过程来看，叶剑英是会议的绝对主角，负责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运作，而具体工作则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和谢富治负责。会议期间，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联名）作了主要发言，这个发言的分量很重，可以说代表了中央军委和中央工作小组的态度。杨、王、雷的联名发言称：“罗瑞卿同志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党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和这次召开的小组会议，严肃认真地揭发和批判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非常必要，非常适时，非常英明的。我们完全赞成，坚决拥护。”

3月18日，罗瑞卿不堪会议对自己的批判跳楼自杀，惟只是摔坏了腿。然而会议并未因罗跳楼自杀而停止，叶剑英随即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第一条，阎王爷办事是有原则的；第二条，罗瑞卿自杀他自己负责；第三条，会议继续开。”（8）

主持会议的叶剑英在总结性发言中称：“‘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须真正地在政治上脱胎换骨！会议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共开了一个月又五天，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除事假病假外，发言的同志有

单独发言的，有联合发言的，共有八十六篇发言稿。从全部发言中可以看到，同志们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有揭发、有批判、有建议。差不多全部的发言，都肯定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篡军反党。认为罗瑞卿同志在工作上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又加上跳楼自杀的叛党行为，已经不能继续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了，应下放改造。”（9）

叶剑英在总结发言中列举了罗瑞卿“篡军反党”的“事实”。这些“事实”的纲要是：“（一）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反党的。”“（1）他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2）他反对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3）他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4）他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5）他歪曲贬低毛泽东思想。”“（二）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林彪同志的，是要篡夺军权的。”“（1）他对林彪同志欺骗封锁，当面拥护，背后搞鬼。”“（2）反对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3）他恶意地攻击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叶剑英还说：“（4）他把林彪同志当作敌人，公然伸手抢班夺权。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向党伸手。他私自封官许愿，拉拢一些人，为他效劳，派人当‘说客’，以林彪同志迟早要登上政治舞台为名，劝林彪同志让权。此外还亲自出面，当着林彪同志的面大喊大嚷地说：‘病号嘛，要象个病号样子嘛！要让贤嘛！’‘不要挡路！’最后还想乘林彪同志有病，把林彪同志气死、逼死、折磨死。其实林彪同志的身体，据医生多次检查的结果，内脏各部都是很好的，只是负伤以后神经功能有点毛病，现在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这是全党全军一个喜报。而罗瑞卿却说想不到这个人还能东山再起！使罗瑞卿大失所望，啼笑皆非。这个人还能算是我们的同志吗？！”（10）

4月8日，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结束，随后起草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邓小平执笔）将中央书记处会议情况及《中央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一并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信中就解决罗瑞卿问题称，“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问题，4月8日已经结束小组会议，工作小组起草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征求了会议各同志的意见，没有采取会议通过的方式。现将这个报告和中央批语草稿送上，请你看看是否可以。我们已在会议上宣布，这个报告须经主席、常委和林彪同志审阅后定稿。”

参加上海会议的周恩来，在北京会议之后对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周恩来说：“这个会开得好，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林总揭发了罗的反党问题，主席亲自抓了这个问题。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野心家。他有修正主义思想，他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他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必然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反对突出政治。个人主义到了一定气候就要向党伸手。”（11）

一个月后的5月16日，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央批语称，“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错误的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同志三月十二日的检讨，以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现在看来，中共中央批罗的整体部署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具体工作则是邓小平、彭真和叶剑英负责，林彪虽然也有涉入，但并非主角，林也没有参与北京会议，会议期间甚至不在北京。

综上所述，《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不是林彪主持搞出来的，而是在邓小平、彭真领导下由叶剑英主导的中央工作组炮制出来的，并由毛泽东最后批准后下发到县团级党委的。黄瑶先生现在批驳《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首先应该批判毛泽东、邓小平、彭真和叶剑英，可是我们通观“黄文”，却见不到黄先生对毛、邓、彭、叶等人的丁点的批判，黄先生就罗瑞卿事件的解析算得上客观和公正吗？

◇ 林罗矛盾的远因和近因

黄瑶先生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提出“远因”说和“近因”说。黄先生认为林彪恼恨罗瑞卿的“远因”是罗瑞卿越过林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而“近因”则是一次军委作战会议罗对一份敌情分析的表态。然而，黄文提出的这些“远因”和“近因”能说明和解释罗瑞卿倒台的根本原因吗？

首先，我们来看“黄文”提出的“远因”说。1960年初，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提出了“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北边以长江为界，对来犯之敌坚决顶住，寸土不让；对南方进犯之敌则考虑放进来打，敌人没有后方支援，放进来之后可以围而歼之。林彪的这一战略构想和部队建设、国防建设等思想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国防与军队发展的方向，得到与会军队将帅们的热烈赞赏和支持。尤其是林彪提出的“北顶南放”的方针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叶剑英曾在军委扩大会议会场上即席插话说：“我听到毛主席对林总‘北顶南放’作战方针特别赞赏。说这是用最简单语言阐明复杂问题的典范。”（12）

黄瑶先生文中引了国内某篇文章说，毛泽东在1964年6月对“北顶南放”方针提出质疑，说：“我看不一定，敌人不一定从南北两翼来，很可能中央突破，隔断南北。”（13）且不说，1960年和1964年相隔了4年，人们的认识会根据形势的发展有所变化。更主要的是，“黄文”引的《毛泽东年谱》里毛的谈话，并不支持黄先生的论点。细查毛泽东在1964年6月16日和7月15日的谈话，其着眼点在于地方也要抓军事，搞民兵建设，各省要建兵工厂，不能仅仅依赖解放军。毛泽东虽然谈了战略问题“敌人从哪里来”，但并未否定林彪的“北顶南放”方针。林彪根据毛的谈话精神迅速做出了回应：“主席6月16日在十三陵的谈话是一个具有最高思想水平的文献，是经过深思熟虑，根据最新情况概括出来的，我们应该据此修改我们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作应付各种情况的准备。”（14）

众所周知，战场上遇到情况都是瞬息万变的，即使再完善的战略规划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包打天下。毛泽东、林彪都不是神，他们都是从中国现实的情况出发，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就战略思想上而言，他们之间不是相互否定，而是相互补充、修改，使之臻于完善。研究者们不能因为日后林彪倒台就否定林彪的战略思想，千方百计用毛的“谈话”否定林的作用。黄瑶说由于罗瑞卿越过林彪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而产生了整罗的动机。然而，1964年7月15日，参与毛泽东谈话的军队将领们不仅有罗瑞卿，还有贺龙、杨成武，他们同时向毛汇报了军队的工作，为何林彪仅仅对罗瑞卿一人不满？所以黄瑶所说的这个林彪整罗瑞卿的“远因”很难成立。黄瑶说：“1965年初，林彪、叶群开始就罗瑞卿的‘问题’同一些干部打招呼。”请问黄先生，林彪向哪些人打了招呼？怎么打的招呼？证据何在呢？

黄瑶先生提出的林彪整罗“近因”居然是罗瑞卿自己的猜测。林彪倒台后，罗在一份揭发林彪的材料中说，由于罗批评了总参作战部的敌情判断，有影射林彪“北顶南放”之嫌，无意

间触怒了林彪，于是成为林彪整罗的近因。罗瑞卿说：“作战会议的接见会上，我究竟在什么问题上触怒了他呢？我就又回头仔细想了，终于想出一件事，问题就可能出在我对作战部那个敌情材料的一部分的批评上。”“他很敏感！他当时已很怀疑我，他会认为我的话是在戳他，在影射他，所以才生那样大的气。但是，虽然恨死我了，可又是说不出口，所以才借口什么‘突然袭击’等等，作为整我的理由。这就是事情的真相。”（15）

然而，这个所谓“触怒林彪”的“近因”并非如“黄文”所言。林彪之所以就军委作战会议总结报告对罗瑞卿发脾气，是罗对老师们缺乏应有的尊敬和自行其是。参与叶群与罗瑞卿谈话的林豆豆回忆说：“林彪看了总长关于六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总结发言的内容，认为是好的。但他感到总长代表军委作这个总结发言，在程序上和方法上对许多老帅和军委领同志尊重不够，没有注意谦虚谨慎。尤其方法上、技术上简单、草率、欠妥。”叶群当晚还苦口婆心地点醒罗瑞卿说：“你不分昼夜的，一心想怎么把军队工作搞得更好，敢管敢负责，当然难能可贵。但是你忙得东跑西跑，也别使人觉得你好像是横冲直撞、盛气凌人的。有些事别看得那么简单了，各方面都要想到。林是了解你的，但是有些领导同志有意见，也许以为你是按林彪同志的意思办的，他们也不好说。特别是对最上面的事，好心办了好事，你还不知道犯着了什么忌讳。政治上也该细心谨慎些；同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老帅们的联系更广些，多请示多尊重他们些，这样，是否更好些。”（16）

正是由于军委作战会议的总结发言一事上，罗“对许多老帅和军委领同志尊重不够，没有注意谦虚谨慎”，引发了老帅们的不满，所以林彪才“发了脾气”，叶群更是提醒罗“同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老帅们的联系更广些，多请示多尊重他们些。”黄瑶先生居然否认叶群这么做是为了给罗打圆场，那么叶群是否应该火上浇油，扩大事件的风波，给罗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呢？

顺带一提的是，“黄文”全篇引用的有关林罗关系的材料仅只是罗瑞卿自己写的自传和揭发，并无其他旁证，属于孤证而已。黄瑶先生仅凭这点孤证是无法支撑起全文论点的。

黄先生提出的林彪整罗的“远因”和“近因”说，都是将一段复杂的历史事件简单化而已。历史事件的发生绝不是某个简单、孤立的因素所造成的，往往是多种因素与合力所导致的结果。罗瑞卿事件亦然。林彪会因为罗瑞卿直接向毛汇报了军队的工作和影射了林彪“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就对罗大动杀机？林彪会因为这点小事就能说服毛泽东整倒罗瑞卿，甚至还能操控政治局常委及动员了众多军队元老和将领们一同将罗打倒？作为长期研究罗瑞卿和罗瑞卿事件的黄瑶先生，居然看不到这么多清晰可见的史实，是有意回避这些令官史撰写者们尴尬的历史还是选择性失忆呢？

◇ 关于林罗之间的矛盾

1964年底和1965年初，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有关问题产生争议，1965年1月3日和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连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17）1月13日下午，刘少奇召集党内生活会，作了自我批评，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陈伯达、李井泉、罗瑞卿。

与刘少奇形成对照的是林彪地位的上升。1965年1月4日，中央军委以〔65〕1号文件转发《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至军以上党委。1月13日，林彪将其指示报送毛泽东。1月15日，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此件早已看过，完全同意，照此执行。”（18）刘少奇在1月18日也批示“完全赞同”。与此同时，1月4日，国家主席刘少奇任命林彪为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月31日，邮电部为了纪念遵义会议三十周

年，发布了一套纪念邮票，邮票的画面突出了毛林在遵义娄山关上的形象，当月的《人民画报》亦以两版的显著篇幅刊登该画。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言：“将毛林并肩战斗的艺术形象首次公开呈现在全国公众面前，并以毛对刘少奇的不满同时出现，似非巧合。它准确地预言了一年多以后‘刘下林上’的政治变局。”（19）

此时林彪的政治行情看涨，参与中央高层政治活动的罗瑞卿不会看不到。1965年2月14日、15日，刘亚楼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向叶群讲了几条意见，希望叶群劝林彪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

罗瑞卿的这四条意见表明，罗看到了林彪政治地位的上升，所谓“早晚要出政治舞台”是说林彪将会担负中央更重要的工作，而军队的工作可以放手交给罗瑞卿打理即可，罗会搞好军队工作的。当然，这样的话也只能凭借刘亚楼与林彪私交甚好的关系私下向林彪进言，这个做法显然不符合中共组织原则。

据《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罗瑞卿2月23日上午去见在上海的林彪，向林彪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的领导，更拥护林彪的领导，说今后是“跟定了”。林彪指出，“要跟党中央、毛主席。”并要他今后改正过去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因罗对刘亚楼谈了许多不应该谈的话，批评了他。黄先生认为罗瑞卿的“四条意见”是叶群编造的，是“死无对证”。然而，笔者认为这恰恰反映出罗瑞卿真实的内心世界。

中共军队历来就有山头，林彪曾经率领过的原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和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是军队里最大的一个山头。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不管谁上台都会启用自己的亲信或信得过的人。林彪在1959年接替彭德怀掌管军队工作后，总参、总政、总后基本上是原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的人马，罗瑞卿是林彪的旧部，曾长期与林共事，是林彪的亲信。林彪此时提名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也在情理之中。罗瑞卿上任后的几年里军队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军队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当中共一把手毛泽东与二把手刘少奇之间发生嫌隙时，参与中共高层政治生活的罗瑞卿应该看到此点，自然也会看出林彪的政治行情看涨。因此罗托刘亚楼向林彪进言并不奇怪。再说这“四条意见”意在抬林，而非踩林，无非希望林放手让罗抓好军队工作而已。说罗有野心不如说罗有政治抱负，说罗“向党伸手”难听一点，但大致也不算错。

从现有资料来看，林彪对罗瑞卿的批评基本上都属工作范畴，诸如“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着学习”等。针对罗与老帅们之间的不睦，林甚至把罗找到家里拿出毛着和党章，要求罗注意加强沟通，实际上就是告诫罗要搞好与军内老帅们的关系。但是，罗瑞卿似乎并未听进林彪的批评和规劝，其锋芒毕露的个性，得罪了众多老帅，引起军中老帅们的强烈反弹，军内最终形成了倒罗的强大势力。至于林罗之间的矛盾，黄瑶先生提出的“远因”说和“近因”说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证明林彪由此而恶意诬陷罗瑞卿主动发起“倒罗”斗争。

罗瑞卿对林彪的态度，除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揭示的一些情况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之外，罗确有对老帅们和林封锁的一面。比如文革前与军事相关的部院合并问题，从目前已披露材料看，罗瑞卿绕过聂荣臻一意孤行，林也不一定知情。1964年11月20日，罗瑞卿办公室电话通知称：“总长关于成立导弹工业部和科研、生产部门合并问题的报告，已经中央批准。”“从军委关于国防工业的建设问题，写给主席和中央的报告，已经快两年了，看来科研、生产部门以合在一起为有利，不仅对生产有利，也对科研有利，不仅对当前

有利，也对长远有利，这是真正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多快好省的办法。这已有大量事实可以说明，绝大多数同志的看法已经一致或基本一致。因此条件已经成熟，是应该定下来的时候了。”“以上已经中央批准（主席、刘、周、朱、邓、彭已核阅同意）。总长指示，马上正式口头通知国防科委、各研究院。”1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为基础，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12月21日，国防工办就关于第六、七、十研究院与生产部门合并问题向周恩来、罗瑞卿报告。26日，罗批示：“拟同意。请总理批准。”周批示：“即送邓小平、彭真核阅。退国防工办。按报告各项分别通知有关部门照办。”（20）罗瑞卿的批示中说“中央批准”，却唯独没提林彪，也绕开了另一位主管军队工作，尤其是主管国防科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聂荣臻，突显出罗瑞卿独断专行的“霸道”的一面。

叶剑英在1966年3、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讲话中说：“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可免地去向党伸手。他私自封官许愿，拉拢一些人，为他效劳，派人当‘说客’，以林彪同志迟早要登上政治舞台为名，劝林彪同志让权。”“罗瑞卿同志跟了毛主席近四十年，受过毛主席许多年的言教身教。在近四十年中，也在林彪同志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过许久的的工作，耳濡目染，宁有几人？罗瑞卿同志当总参谋长也林彪同志和总理推荐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对他工作中的错误，多次批评，诚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罗瑞卿同志对林彪同志的批评、指责、教育，如果自己认为有委曲之处，何以不报告毛主席？而竟同刘亚楼等同志密谈！跟毛主席几十年，还不把毛主席看作父兄师长。难道这样做，不是有意背着毛主席，故意和林彪同志作对吗？”（21）

叶剑英是中央工作小组的负责人，是《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的主要起草人，他的总结讲话代表了中央工作小组的对罗瑞卿问题的态度，这份报告也决定了罗瑞卿日后的命运。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的同一天，中央也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并附有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的发言。

◇ 罗瑞卿与贺龙的关系

黄瑶先生用了很大的篇幅批评邱会作回忆里关于罗瑞卿和贺龙的关系，黄先生认为，根本不存在“罗瑞卿上了贺龙的船”这桩事，这一说法是对罗瑞卿与贺龙的诬陷。但是笔者认为，黄先生现在当然可以持这一观点，但是并不意味着那些身涉罗瑞卿事件的当事人们没有这样的看法。

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师们都认为罗瑞卿搞了小圈子。邱会作就曾亲耳与闻叶剑英与聂荣臻的谈话。邱回忆说：“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了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我听到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我的脑子一转，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

叶剑英甚至把邱会作叫到自己家中打招呼，叶剑英向邱会作打招呼时说：“林总指出：长子这个人变了，可能是官大，权大，他一身从头到脚都是官。他当总参谋长之初，还注意总参谋长的身份，现在是独揽一切，他俨然是军队统帅了，把我和聂都不放在眼里，刘帅、徐帅和你（叶）就更不在话下。”“长子同他的‘同盟’（指贺龙）已经搞起了一个圈子。他有了小圈子就把杨成武、李天佑、吴法宪、萧劲光、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放到圈子外，反而作为他们

的‘争取’的对象了，有时还给他们穿小鞋。有的人不愿穿小鞋，有时还敢顶起来。”叶剑英最后说，“长子竟然咒骂起林总来了，让林总让贤、让权，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但仔细一分析，应该是可以想通的。第一，‘长子’急于上台，是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不好之上的。第二，‘长子’搞大比武，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军事家，捞到政治资本，好‘光荣’上台。第三，‘胡子’是历来就搞自己山头的。他自己的山头，人手并不多，于是就注意召集‘散兵游勇’，把‘无家可归’的人，搞到自己门下来。第四，‘胡子’、‘长子’利用了林彪身体不好，筑起了自己的圈子，特别是把林总很信任的人都挖过去了（叶帅指的是萧华、梁必业、吴克华等人），这是影响很大的。”（22）

李作鹏回忆说：“随着罗瑞卿权力越来越大，据我所知，当时已有老师对罗在军委的日常工作中，小事不请示，大事不报告，对老师工作不支持等颇有微词，叶帅、聂帅就是其中的两位。”叶剑英就罗瑞卿问题向李作鹏打招呼时说：“这个人（罗瑞卿）很霸道，目空一切，到处伸手，要注意哩。过去我们想巴结他，也巴结不上，这种人不会有好下场。”（23）

除贺龙外，叶剑英还向其他打元帅们打了招呼。此外，打招呼的对象还包括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等军内高官。叶剑英打招呼的目的就是提醒这些人不要陷入贺龙、罗瑞卿的“小圈子”里去，这实际上也是为了最终解决罗瑞卿问题做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65年12月初上海召开的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事前完全被蒙在鼓里，打了贺龙一个措手不及，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根本就不想让贺龙与闻此事，理由只有一个，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而非林彪，解决罗瑞卿问题很可能会牵涉到贺龙。但是，这次上海会议并没有涉及到贺龙。显然，毛泽东在处理罗瑞卿事件时还是有自己的分寸的，并不想一下子牵连太广。邱会作和李作鹏看望林彪时，林彪说：“主席定了，罗瑞卿的问题中央接手处理，对贺龙的问题，这次准备不提，和罗瑞卿分开。”（24）1966年3月，毛泽东干脆委派贺龙去大西南视察钢铁基地攀枝花，根本无缘参与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4月9日贺龙回到北京，此时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已在前一天结束了。

综上所述，罗瑞卿事件自始至终，贺龙虽然贵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但是却完全被排除在中央及军委核心层之外，贺龙已然失宠于毛泽东。虽然，无论是上海会议还是北京会议都没有牵扯到贺龙，但是随着罗瑞卿的倒台，贺龙再也无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此时的贺龙实际上被毛打入了“冷宫”，叶剑英成了中央军委仅次于毛泽东和林彪的当家人。

几点总结

第一，余汝信先生主编的《罗瑞卿案》一书是近年来有关罗瑞卿事件研究的最新成果，不仅发掘了珍惜的历史文献，而且就此事件发表了不同于官史研究的文章。我们并不自诩这些新的成果可以彻底揭示这段历史，但它却是朝着历史的真实迈出了一大步。

第二，罗瑞卿事件并非简简单单一个林彪与罗瑞卿之间个人矛盾或恩怨的结果，而是解放军内部形成了一股倒罗的强大势力，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罗瑞卿个性所造成，罗与军内老帅们关系的紧张、不睦使得矛盾逐渐尖锐、恶化。倒罗实际上是军中高层将领们的一次联合行动。

第三，罗瑞卿事件中，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是最终拍板的决策人，林彪虽然也有涉及其中，但是林彪并未参与倒罗的具体工作。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言：“罗瑞卿一案是毛抑或是林首先主动提出尚有争议的空间”，研究者们还需要更多的史料还原这段复杂的历史。

第四，黄瑶先生重点批判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不是出自林彪之手，而是出自邓小平、彭真和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中央工作小组之手，对罗瑞卿错误的认定和所下的结论也是他们在会前和会后向毛泽东汇报并由毛批准之后下发的。批判罗瑞卿的主角恰恰是黄瑶先生绝口不提的叶剑英、萧华、杨成武等人。未知黄先生又如何解释这一历史事实呢？

第五，黄瑶先生试图通过诠释1965年5月下旬的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发生的风波，解析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矛盾的由来，仅凭这么一场“风波”断定林彪是罗瑞卿的倒台的元凶。然而，通过本文的论述，黄先生的观点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

注释：

- （1）、余汝信主编《罗瑞卿案》，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版，第244页。
- （2）、余汝信《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增订版）》，载《新史记》第26期，2015年6月。
- （3）、（4）、（5）、（6）、（7）、（9）、（10）、（11）同（2）
- （8）、《邱会作谈罗瑞卿问题》，载《罗瑞卿案》，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版，第179页。
- （12）、程光《历史的回顾》，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329页。
- （13）、李德义《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历史发展与思考》，《军事历史》2002年第4期。
-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363、375页。
- （15）、转引自黄瑶《1965年中央军委作战会议风波的来龙去脉》
- （16）、余汝信主编《罗瑞卿案》，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版，第188—190页。
- （1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460—463页。
-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314页。
- （19）、（21）、同（2）
- （20）、航空工业部中国航空工业史编辑办公室：《中国航空工业科研大事记（1955—1984）》，1987年2月，第157—158页。
- （22）、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78—379页。
- （23）、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37—538页。
- （24）、《罗瑞卿案》，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版，第176页。

□ 原载《新史记》第27期，2015年8月

~~~~~

【史海钩沉】

1966年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的由来

• 余汝信 •

◇ 刘志坚、王年一、范硕、王力说

1966年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下发的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简称《紧急指示》），是“文革”中的一份重要文件。《紧急指示》原意仅针对军队院校，“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中央的批示却大大扩展了其适用范围：“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客观地说，《紧急指示》存在两重性。正如“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所言：“《紧急指示》是适应‘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求而产生的。它有正确的方面，为运动初期被冤屈地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人平反，这是正确的；但是总的说来，它有着十分严重的错误。它实际上规定了更大范围内的‘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它的要害。”

至于《紧急指示》的由来，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称：“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负责人，向毛泽东、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林彪下令要全军文革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1966年间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在其《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一文中，有着与王年一几乎完全相同的说法：“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二医大‘红纵’一派的头头向毛主席和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对群众限制太多。林彪就下令要全军文革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法。”

刘志坚是《紧急指示》起草人之一。从表面上看，《紧急指示》由来公开披露的时间，王年一早于刘志坚，但只是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曾明言依据“刘志坚的回忆”。笔者推断，“刘志坚的回忆”即《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应早有一内部流传的版本，王年一依据的，也应是这一内部版本。

1995年3月出版的《叶剑英传》（由范硕任组长的《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在刘志坚、王年一的说法前面加了一句话，变成“他们经过精心策划，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军文革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

以后，范硕在私人著述《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中，将上述这段话修改为：“这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的喽罗们唆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林彪看毛泽东没有反对表示，就说军队这样搞不行，要采取措施。回来以后，第二天下午，对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作了‘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所谓第二军医大学“红纵”“一派的头头”或“一个负责人”或“一个头头”，姓甚名谁？刘志坚、王年一和范硕均未作交代。

王力在回忆录中则直接点名道：“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人向毛主席、林彪反映情况。据我了解，反映情况的是陶斯亮，她是陶铸的女儿，第二军医大学的学生。”

#### ◇ 陶斯亮否认与其有关

2015年春节后，笔者有机会两度见到陶斯亮。就笔者关心的有关她向毛泽东、林彪告状的传闻，陶斯亮爽快地作了回应。她所回忆的事情经过，与坊间说法相距甚远。

陶斯亮说：1966年9月13日晚，我们二医大五名女生，在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赴沪串联的学员鼓动下，离沪乘火车赴京。10月1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碰见李讷，李讷热情地叫我去见主席——她的父亲。她把我带进了城楼上一间颇大的休息室，只见主席一个人在里头抽烟。（据陶斯亮《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一文：陶斯亮见到毛，“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毛泽东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他将铸念成巨）的女儿。’”）我父亲（陶铸）进来一会儿又出去了，他对主席说：“亮亮是逃跑出来的。”主席问我怎么一回事，我慌乱地、前言不搭后语地将学校不让我们串联、我们“冲破阻力”到北京的事说了一遍。主席听了说：“李讷，你就没有亮亮的造反精神。”主席好似并不特别关注我的告状（我的表达也是混乱的）。他谈笑风生，还拿我的名字开玩笑说：“陶斯亮，陶元亮（陶渊明字元亮），你就是如此这般的陶渊明。”

陶斯亮说：偌大的休息室里，只有主席、李讷和我三个人。林彪自始至终不在场。说我向毛泽东、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有什么人能证明？我一个军校小学员（陶斯亮时为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应届毕业生），敢当着林彪的面向主席控诉军队镇压学生吗？借我个豹子胆也不敢啊！

陶斯亮又说：与主席谈话，本来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事儿。有人说什么“他们经过精心策划”，又说成是“江青喽罗们唆使”，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针对坊间有邱会作得知“陶斯亮等几个人”向毛泽东告状而“请人帮忙凑过去听”这一奇谈怪论，陶斯亮重申：那天见主席时，除李讷外，仅有我一人在场。凡进过天安门城楼休息室的人都明白，在那种封闭的环境下，想搞什么偷听，没门。

陶斯亮最后说：见过主席，我并没有到处宣扬，连同学们我都没有对他们说。那么，所谓“告状”消息，是怎么第二天就传到林彪那儿的，刘志坚又是从哪儿得知的，我确实一头雾水，无从考究。

#### ◇ 汪志杰的说明

带着未解的疑团，笔者请教了当年第二军医大学“红纵”核心——勤务站的成员汪志杰。汪志杰诉说了他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当然，汪所说的仅代表了他本人及“红纵”一派的观点）：

#### 第二军医大学学员“逃兵”问题

“1966年8月底，二医大学员中的少数派（可以说是‘红纵’的前身）部分骨干成员在海医系操场碰头，讨论了学校的‘文革’形势。参加者有军医系及海医系多个年级的代表，包括我和×××在内，十人左右。大家对于运动以来学校党委的许多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特别是‘八一八’之后学校领导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更令我们十分气愤和担忧。当时我们只

是觉得问题的症结在学校党委，必须尽早向上级汇报，由总后党委来解决和纠正学校领导的问题，否则学校的文化革命有可能夭折和流产。”

“×××自告奋勇去北京，8月29日就带了两位同学启程。×××走后的第二天，整个学校就沸腾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字报指名道姓地将×××三人称为‘逃兵’，声言要抓‘逃兵’。大字报几乎完全变成了对少数派的围剿，不同观点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开始显现并愈加明显。”

“×××等走后，上述骨干曾数次碰头，就学校运动的形势交换了看法，认为目前学校运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加糟糕。由于×××走后我们无法与她取得联系，觉得必须设法把她离开学校后发生的这些情况带去北京。时间到了9月中旬，我们觉得不能再等了，要尽早去北京，而且去的人要多一点儿，才能形成声势。于是，我和军医六二级一名学员、军医六一级的五名女学员和海医六二级的五名男学员同时离开学校，于9月15日到达北京。第二天一早，学校就掀起了第二波抓‘逃兵’的热潮。”其实，总参、总政于9月12日已发文同意军队院校学员有组织地分批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二医大校方有没有及时传达贯彻总参、总政的通知精神，我们未得到详细资料。到了9月下旬，二医大学员的大部队已有组织地抵达北京。

#### “红纵”成立时间

“10月5日《紧急指示》公布当晚，在北京后勤学院（二医大学员在京住地）召开了各年级相同观点骨干会议。到会人员有十余人。对于军委《紧急指示》，大家感到非常激动和兴奋。对于《紧急指示》中央决定军队院校文化革命与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理，表示完全赞同，决定也成立一个群众组织。由于此前从未想过军校也能成立群众组织，所以对于组织名称一时拿不定主意。到会人员比较了当时地方各高校群众组织的名称后认为：我们这个组织的名称，与他们应该有所不同，不要简单地照搬别人什么‘造反队’‘造反团’之类。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为我们这个组织取名为‘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换言之，10月1日，“红纵”并未成立，所谓当日“红纵”“一个负责人”或“一派头头”或“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

#### 陶斯亮在“红纵”的地位和作用

“陶斯亮确实担任过‘红纵’勤务站勤务员，时间从1966年10月5日《紧急指示》公布、‘红纵’成立之日起，至1967年1月4日她父亲被打倒时止，满打满算正好三个月。陶斯亮在‘红纵’勤务站里属‘温和派’，从不张扬，从不盛气凌人，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我至今难以理解，当年陶斯亮怎么会参加‘红纵’？1966年‘红纵’在北京批斗邱会作时她在上海，1967年‘红纵’二上北京批邱，并组织三座门静坐时她已退出‘红纵’。”

“‘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陶斯亮从未告诉过我，我也从未听说过她上天安门当面向毛和林反映二医大的事。”

#### ◇ 反映者另有其人

其实，在“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都有材料表明，向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促使林彪下决心并经毛泽东同意发布《紧急指示》的，并非陶斯亮而另有其人。

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称：“此时，又有上海二医大‘红纵’的一个红卫兵代表，拿着‘血衣’，来见林彪、叶群，要求给予支持。林彪脑子一热，又要采取行动了。1966年的国庆节一过，林彪告诉赵根生，立即把全军文革的负责人找来。他指着二医大送来的血衣对大家说：‘如果我们不支持学生造反，就要犯大错误。’接着他指示，要对军队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一律实行平反，要销毁一切有关他们的‘黑材料’，要允许他们搞‘四大’，要支持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准许他们去全国各地‘大串联’。林彪指令全军文革据此拟一份军委命令，准备以布告形式张贴出去。”

王力也说：“还有一姓屠的，也是高干子女，她到林彪家里反映军事院校镇压群众。因此林彪决定要发一个紧急指示，说军事院校要按地方的搞法。这个文件是林彪听取了情况反映后口授的。”

张云生、王力所指，其实都是×××。但两人所说均不甚准确（王力甚至连姓名都搞错了）。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来自当年“红纵”自己办的报纸《红色造反报》。该报1967年2月4日出版的第六期第一版的一篇报道《叶群同志会见“红纵”等革命造反派代表》称：“〔本报北京二十五日讯〕昨天深夜至今日凌晨，叶群同志（全军文革小组成员、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受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的委托，带着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亲笔信件，来到我校‘红色造反纵队’勤务站，会见了我们‘红纵’代表和总后机关，四、七医大，兽医大，后勤学院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代表们汇报由邱会作一手策划的镇压革命学员的‘九二七’事件时，叶群同志告诉代表们，《紧急指示》与此有关。有件衣服（指×××受围攻时被撕坏的衣服）撕掉了扣子，还有一封血书。林豆豆拿着衣服给他爸爸看，几位副主席都在场，我在旁边看着哭了。林副主席看了很生气，由他建议起草了《紧急指示》。”

上述材料表明，《紧急指示》的确与陶斯亮无关，而与×××有些瓜葛。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无论×××抑或是其他什么人的反映，在《紧急指示》形成的过程中，不过是一剂催化剂而已。正如王年一在20世纪90年代修订过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所加的一个注释所言：“林彪下令，不是因为‘红纵’一人（学生）反映了什么，而是因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此需要，一学生的反映不过适逢其会而已。在《紧急指示》定稿的当天，中央就加以批转，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当日就转发了《紧急指示》，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这个文件的重视。”

□ 原载《党史博览》2015年第12期

~~~~~

【史实考证】

以讹传讹的林彪专机黑匣子

• 蒋 健 •

有人说：“‘林彪事件’真正能够研究清楚，做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需要档案资料的大量开放和黑匣子的成功解密。但是，档案资料的开放是很难的，而且即使开放了，档案资料曾否被篡改也难以确定；何况黑匣子现在更不知身在何处。所以，这一事件的澄清看来会遥遥无期。”（1）

目前，“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或其亲属，“九一三事件”的国内外研究者，普遍认为坠毁的林彪专机的黑匣子被苏联人拿走了，比如：

林彪专机驾驶员潘景寅之女潘鹭就认为：“黑匣子一直在苏联”。（2）

独立研究者舒云断言：“林彪专机黑匣子在苏联手里”。（3）

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朝伦·达西达瓦在其《林彪元帅之死》一书中说：“苏联人把坠毁飞机的黑匣子也取走了。黑匣子里有很多仪表，记录着工作情况和人员谈话，是比较可靠的工具。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蒙古肯特省公安厅厅长）认为不行，不能让他们拿走，但是朝克将军（蒙古人民军空军司令）还是把黑匣子给了苏联人。苏联人拿走黑匣子之后，从来没有对蒙古讲过黑匣子里有什么内容，这给我们调查飞机坠毁原因带来了困难。”（4）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担任中国驻蒙古使馆二秘并到过林彪专机坠机现场勘察、后来出任过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的孙一先认可达西达瓦的说法，并表示：“三叉戟256号上的黑匣子，以及死难者的遗体 and 遗物，何时能够回到我国呢？我认为按照国际惯例，俄罗斯和蒙古当局这么无限期地扣押下去，是没有什么道理和法理根据的，我国应该在适当时机索要。”（5）

更有甚者，国内还有林彪专机黑匣子已被俄国政府交还给中国的传言：至今健在的某中共元老2008年在中南海听了林彪事件黑匣子，里面有林彪的声音，说了“回来”或者“回国”。（6）

◇ 黑匣子传言的源头在哪里？

无风不起浪。那么，关于林彪专机黑匣子的种种传言的源头在哪里呢？

笔者认为，黑匣子传言的源头来自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1993年对前苏联的林彪专机坠毁事件调查组的负责人、原克格勃将军扎格沃兹丁的采访。汉纳姆关于林彪事件的实地调查报告，《揭开一个中国人之谜——林彪的最后日子及死亡》，发表在1994年1月31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1994年7月8日北京出版的《作家文摘》第80期摘登了李安定写的关于彼得·汉纳姆调查活动的《林彪之死真相查访记》，文中提到，汉纳姆曾经问当年负责调查林彪专机坠毁事件的前苏联克格勃将军扎格沃兹丁那架飞机上是否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这是中国公众首次知悉林彪专机有黑匣子的“事实”。而在此之前，中国的“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或研究者，不知道林彪专机是有黑匣子的，比如去林彪专机坠机现场勘察时的孙一先就不知道林彪专机有黑匣子，而且之后的很多年他也不知道。（7）

不过，真正让中国公众广为认知林彪专机有黑匣子的人首推康庭梓。作为当年林彪三叉戟专机的副驾驶，康庭梓自1990年代末开始，通过《党史博览》、《文史精华》、《湖北文史资料》等期刊以及个人回忆录（8），还有一些电视采访节目，讲述其“九一三事件”发生时的亲身经历，分析林彪专机坠毁的原因，并反复提到黑匣子，比如，他说：“林彪座机256号的黑匣子中的事故记录器，是直径约15厘米的圆球状物体，象一个金属制造的小西瓜，安装在飞机尾部的垂直安定面内。”“256号的语音记录器是一个扁平的长方体，长约40厘米，宽7到8厘米，高约15厘米。它的位置在前驾驶舱领航员后面的无线电设备专用架上，用手推进去后固定在架子上。语音记录器的传感器，位于前驾驶舱顶上，那里有一个带网状小窗口，里面安装着象送话器一样的设备。语音记录器的性能是，在正常飞行中，不仅能记录下来空中与地面之间的通话内容，还能记录下来驾驶舱内的人员彼此直接说话的内

容……”。“只有根据飞机迫降落地前语音黑匣子的真实录音，才能真正知道飞机从下降开始后，驾驶舱内所发生的一切……。不能排除，语音黑匣子的记录也许为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情况。”“黑匣子是被人拿走的。”（9）

康庭梓的说法得到了孙一先的呼应，他说：“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1 E 型’开始，已装有 70 年代稀有的黑匣子。……似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 256 号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拆走了。”（10）

林彪事件发生时担任空军专机师师长的时念堂的表态比康庭梓还进一步，他说：“‘黑匣子’是飞机制造时就安装上的，它们记录的资料都是原始的客观的，人们不可能对其中的资料进行篡改，而且异常坚固。”“根据我们以飞行专业的眼光判断，这些‘黑匣子’一定还保存在某个地方，不会随着 256 号三叉戟飞机的爆炸消失。”“林彪叛逃所乘坐的 256 号三叉戟飞机上的所有人员都死了。死无对证。但是，‘黑匣子’还‘活’着，还‘活’在某一个地方，它还能说话。”（11）

但是，上述说法是否有确凿的事实为依据呢？

◇ 苏联人是否真的在坠毁的林彪专机上找到黑匣子？

尽管扎格沃兹丁对彼得·汉纳姆说林彪专机黑匣子找到了，但他并没有给出物证，比如黑匣子的具体型号，而且俄罗斯官方对黑匣子一事从来没有给予回应过。

而汉纳姆的采访报道问世不久，俄罗斯军队的《红星报》就发文证实汉纳姆关于林彪下场的报道所言非虚。（12）

既然俄罗斯当局能把林彪、叶群的头颅被切下来放在大锅里用开水煮，以便将毛发、皮肉剥离干净这样一些看似残酷又恐怖的做法，都公布出来，为什么就不能公布对黑匣子的鉴定过程呢？

不过，从扎格沃兹丁的“三叉戟飞机几乎飞越蒙古，快到苏蒙边境时才突然掉头南飞并在随后坠毁”的说法来看，他既对三叉戟飞机的性能根本不了解，更对早期黑匣子的发展史基本无知。

因为从 256 三叉戟飞越的中蒙边境 414 号界桩到靠近蒙古的俄罗斯（前苏联）边境城市赤塔的距离约为 800 公里，而赤塔距温都尔汗的三叉戟坠机现场有 600 多公里，减去扎格沃兹丁说法中“快到苏蒙边境”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比如三叉戟在距赤塔还有 50 公里左右时就折返，也就是说，按照扎格沃兹丁的说法，三叉戟在越过国界之后又飞行了大约 1300 公里。而根据蒙古当年发布的《关于中国飞机失事》的消息，三叉戟在 9 月 13 日 1 点 55 分越过中蒙边境，在 2 点 25 分坠毁。（13）所以按照扎格沃兹丁的说法，三叉戟的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 2600 公里左右。尽管三叉戟 1 E 在高空时的巡航速度在 930 到 970 公里 / 小时之间，但林彪专机在进入蒙古后，一方面是为了闪躲雷达，另一方面是为了寻找机场或者迫降场，所以始终是低空飞行，而由于低空空气阻力大，它的实际飞行速度只有每小时 700—800 公里。这也就是说，扎格沃兹丁把林彪专机的实际飞行速度夸大了三倍多。

此外，黑匣子分飞行数据记录器（FDR）和舱音记录器（CVR）两部分。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客机被强制安装 FDR 都要比强制安装 CVR 早至少六年以上。这意味着如

果扎格沃兹丁真的找到了黑匣子，那么不仅有CVR，更应该有FDR，那么扎格沃兹丁就不会出现把林彪专机的航迹都搞错的情况，因为第一代的FDR实际上就是一个航迹记录仪！

◇ 黑匣子是飞机制造时就安装上的吗？

时念堂说：“‘黑匣子’是飞机制造时就安装上的”。

果真如此吗？

我国在1972年到1975年期间，从英国直接定购了35架比“三叉戟1E”更先进的“三叉戟2E”和“三叉戟超3B”客机，但它们都没有装配黑匣子，尽管这个时候英国要求本国运营的客机必须装黑匣子的法律规定已经执行多年。

实际上，这些直接从英国买进的三叉戟客机直到1980年代才装上黑匣子。因为1982年空军司令部司科字第45号文件“飞行参数记录系统主要战术技术要求”中明确规定“1985年后，我国所有飞机都要装飞行数据记录仪”，所以我国民航才在1983年引进了77套美国S·D·C公司生产的UFDR飞行数据记录仪，装在三叉戟、安-24和伊尔18三种飞机上。（14）

值得注意的是，这77套FDR并不是从英国买进的。

而林彪专机所属的“三叉戟1E”型客机是英国霍克·西德利公司在1965年上半年交付给巴基斯坦的。那批飞机是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在1964年之前向霍克·西德利公司下的定单。1963年和1964年出版的《国际航空》和《飞机工程与航空航天技术》曾经广泛和深入地宣介三叉戟，尤其是对“三叉戟1E”的构造给出了详细的图示，比如将飞机的结构划分为112个部分，给出了空气系统22个部件、飞行控制14个部件、除冰系统11个部件、燃料系统14个部件、液压系统4个部件、动力装置17个部件、无线电和电系统26个部件、安全设备6个部件、驾驶舱和客舱27个部件的具体位置，但根本没有提到FDR和CVR；还介绍了支持霍克·西德利公司“三叉戟”项目规划的诸多厂家所生产的特种材料、部件、辅助和附属设备，仍然没有FDR和CVR的片言只字。

由此可见，无论是FDR，还是CVR，都不是“三叉戟”制造时的必配设备，也就是说，按照定单，霍克·西德利公司根本不会为“三叉戟1E型”客机装配黑匣子。

◇ 三叉戟是从1E型开始才装配黑匣子的吗？

孙一先说：“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1E型’开始，已装有70年代稀有的黑匣子。”他的意思是三叉戟1E之前的型号，比如三叉戟1C，就没有装配黑匣子，而从三叉戟1E开始，后续型号的三叉戟都装配了黑匣子。

从笔者前文提到的那35架中国直接买入的“三叉戟2E”和“三叉戟超3B”都没有装配黑匣子来看，孙一先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实际上，不管是哪种型号的三叉戟，装不装黑匣子完全取决于客机所属国的空管法规。

世界各国空管机构强制要求本国飞机安装黑匣子的法规的出台有先有后，制定的标准也不一致。

那么，英国航空注册局是哪年要求本国飞机必须安装黑匣子的呢？有什么具体规定呢？

简言之，对于1965年7月1日以后飞行的新型号飞机或者首次飞行的飞机，不管是重量超过60,000磅的以活塞式发动机作为动力的飞机，还是重量超过12,500磅的以涡轮式发动机作为动力的飞机，都应酌情装配经过认证的抗毁型FDR；1966年7月1日以后，上述种类的所有飞机，即重量超过60,000磅的活塞式发动机飞机和重量超过12,500磅的涡轮式发动机飞机，都必须装配抗毁型FDR。FDR应能记录每次飞行期间，即从飞机起飞开始到落地滑行结束，以下作为时间函数的参数：指示空速，指示高度，磁航向，垂直加速度，俯仰姿态；前三个参数的采样频度不得低于每秒一次，后两个参数的采样频度不得低于每0.2秒一次。

从上述规定看，起码在1966年7月以后，黑匣子在英国就不是什么稀罕物了，孙一先说黑匣子是“70年代稀有”，显然不实。由于所有型号的在役三叉戟飞机，不管是1964年2月获得适航证的“1C型”，还是1965年11月获得适航证的“1E型”，重量都远超12,500磅，因此只要它们在英国航空注册局注册了，那就必须在1966年7月1日前装配FDR。

至于中国和巴基斯坦购买的三叉戟客机不装黑匣子的缘由是当时这两个国家都没有相关的法规，而与这些三叉戟的型号无关。

◇ 三叉戟会装舱音记录器吗？

需要注意的是，英国1965/66年强制要求飞机安装的黑匣子只具备FDR的功能，并不同时拥有CVR（舱音记录器）的功用。

而扎格沃兹丁、康庭梓、孙一先和时念堂关于黑匣子的说法之所以如此撩人，就是因为他们提到黑匣子时最出彩之处就在CVR，比如康庭梓就认为：“语音黑匣子在记录起飞后半个小时的机舱对话中，肯定能反映出林彪等人在强迫潘景寅转向叛逃航线的过程中那卑劣手段的丑恶表演。”（15）不过，早期CVR的法定录制时间为30分钟，这除了技术成本之外，还考虑了西方对飞行员人权尊重的因素。（16）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CVR的法定录制时间才被延长到2小时。因此即使林彪专机装了CVR，而且这个CVR日后被发现，也不会再现康庭梓想象的那些“丑恶表演”，因为林彪专机飞了接近两小时，CVR前面录制的信息会被后边录制的信息所覆盖。

那么，英国空管机构是哪年要求本国飞机必须安装CVR的呢？三叉戟会装CVR吗？

不言而喻，对于飞行事故调查而言，只有五个飞行参数记录的FDR黑匣子根本不足以搞清事故原因，因此有关的修改提案于1969年出台，众多相关机构的代表于1970年组成了一个飞行数据记录工作小组。该工作小组的报告于1971年公布，该报告考虑/借鉴了国际民航组织（ICAO）的建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等空管机构对黑匣子的技术要求，打算通过修订1972年的空航法令使得对黑匣子的新要求生效。

修订后的1972年空航法令要求：

对“现有”飞机，FDR要增加三个参数的记录，这三个参数是发动机功率、襟翼位置和滚转姿态。

对“未来”飞机，总共列出了26个参数（包括时间）。就常规的亚音速飞机而言，记录要求为：对于最大重量在5,700千克到11,399千克的飞机，既可以只安装一个CVR，也可以只安装一个记录规定参数1—9的FDR；对于最大重量在11,400千克到26,999千克的飞机，既要安装一个CVR，也要安装一个记录规定参数1—10的FDR；对于总重量超过27,000千克的飞机，既要安装一个CVR，也要安装一个记录全部26个规定参数的FDR。

按照1972年修订后的英国空航法令，尽管各种型号的三叉戟飞机，包括三叉戟1E（最大机身重量58,060千克）、三叉戟2E，重量都超过27,000千克，但也只须把FDR记录的参数由五个增加到八个，而无须安装CVR，因为它们统统属于“现有”飞机。

事实上，当时英国发生的一起空前的飞行事故帮助英国通过了飞机安装CVR的法令。1972年6月18日，英国一架三叉戟客机在斯泰恩斯地域坠毁，包括九名机组人员在内的118名乘员全部遇难。随后的事故调查表明，虽然FDR信息有相当价值，但调查人员如果能确定机组成员之间通过命令、评论或惊叫所传递的信息，那么他们就会有一个清晰得多的导致坠毁事故的事件系列的场景。

即使是这样，英国当时也没有要求包括三叉戟在内的“现有”客机安装CVR。比如，1975年9月15日，英国航空公司所属的一架三叉戟1E型客机在西班牙毕尔巴鄂机场发生了一起小事故，这架飞机就没有安装CVR。

此外，前述空军司令部司科字第45号文件只是规定“1985年后，我国所有飞机都要装飞行数据记录仪”，并没有要求装CVR。

起码到1988年，我国空管机构还没有要求客机装CVR，比如，民航广州局属下的“三叉戟2E”型2218号客机1988年8月31日在执行广州——香港航班任务并在香港启德机场盲降时发生一等飞行事故，造成六名机组人员和一名旅客遇难。香港民航当局公布的事故调查报告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确定事故发生的原因。（17）为什么说没有足够的证据呢？该事故调查报告中说：飞行舱内的机组人员无一幸存、没有CVR，加上UFDR所记录参数的数目过少，严重妨碍了确定最终进近事件顺序的调查。

◇ 中国有人见过那批三叉戟飞机上的黑匣子吗？

其实，黑匣子只是一个数据记录器，它与传感器、采集器组成数据/语音采集记录系统，它所记录的信息事先经过编码处理，最终要经过与之配套的地面处理系统进行解码复原。如果当时飞机装有黑匣子的话，驾驶舱会有相应的显示黑匣子工作状态的指示器，比如采用循环原理的黑匣子在进行清除、记录和监控功能的操作时，都会向机组人员提供一个该系统正确工作的连续指示。

而且当时的黑匣子在日常使用中容易出现电机、凸轮、轴承损坏等现象，因此需要对黑匣子进行定期检修，甚至更换记录介质。如果那一批三叉戟真的装配了黑匣子，肯定会有人接触过这些黑匣子。尽管林彪专机摔在了蒙古，但1970年与它一起从巴基斯坦买进的另三架三叉戟始终在国内，却从来没有在它们之中发现过黑匣子的传闻，而其中的254号还曾经是巴基斯坦总统的专机。

此外，如果那四架三叉戟飞机在卖给中国时真的装配了黑匣子，那么配套的地面解码处理设备也会被一同卖给中国。然而，40多年来，从没有任何中国人说见过此类设备。

结语

由于扎格沃兹丁、康庭梓、孙一先和时念堂，或者作为林彪事件的见证人，或者作为某领域的技术专家，或者二者兼具，因此他们关于林彪专机黑匣子的回忆和表态自然起到了三人市虎的作用，导致许多人信以为真。

然而，历史不忍细究。细究起来，就可断定中国1970年从巴基斯坦买入的那批三叉戟客机，既不可能安装FDR，更不可能安装CVR。所谓的林彪专机黑匣子纯属以讹传讹！

注释：

- (1) 马学磊：《难以拨开的历史迷雾》，《二十一世纪》，2010年2月号，总117期
- (2) 潘鹭：《女儿眼中的潘景寅——爸爸决不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文史参考》，2011年9期
- (3) 舒云：《“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文史参考》，2011年17期
- (4) 舒云：《蒙古学者披露林彪飞机坠毁细节》，《文史参考》，2011年17期
- (5) 孙一先：《林彪坠机后，因何没找黑匣子？》，《文史博览》，2010年10期
- (6) 舒云：《林彪飞机黑匣子被中国要回来了？》，
blog.sina.com.cn/s/blog_4447da480100puu9.html
- (7) 孙一先：《林彪坠机后，因何没找黑匣子？》
- (8) 康庭梓：《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7月
- (9) 康庭梓：《林彪座机256号上的黑匣子哪里去了？》，《党史博览》，2000年5期
- (10)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108页
- (11) 时念堂，孙焕英：《历史将揭开林彪案件的更深层面》，《民主与法制》，2005年3期
- (12) 俄罗斯《红星报》：《林彪遗骸是怎样鉴定的？》，引自《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201—203页
- (13) 许文益：《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使命（二）——视察林彪机毁人亡现场和对外交涉》，《世界知识》，1988年2期
- (14) 刘军仓：《飞行数据记录仪》，《国外试飞》，1995年2期
- (15) 康庭梓：《“林彪座机”副驾驶谈三叉戟256号黑匣子》，《湖北文史资料》，2002年3期
- (16) 谢孜楠：《飞行记录器在民航飞行安全中的应用》，《宇航材料工艺》，2000年增刊
- (17) 《1988.8.31飞行事故》，http://www.camac.org.cn/news/show.php?news_id=1177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